

内部资料

经济资料

第一期

(总第 27 期)

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

一九八一



目 录

关于研究新中国三十年经济史的几个

问题 房维中 (1)

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概况 穆家军 (10)

关于布哈林国际学术会议的几个问题 ... 苏绍智 (26)

——10月24日在北大的报告

从常德市看竞争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好处

..... 周积智 (52)

对“政治经济学对象与方法”讲授中几

个问题的一点浅见 常 莹 (64)

中国历代人口政策 宋静安 (83)

《经济资料》一九八〇年目录 (106)

F-53
3
81(1)

T-53
3
81(1)

关于研究新中国三十年经济史的 几个问题^①

房维中

一、历史分期

大的方面可分为五段：

1. 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在中央、毛主席、陈云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很顺利。当时的内忧（平叛、清匪、反霸等）、外患（抗美援朝战争）都有，但整个工作井井有条。原来预计要三年，果然三年就完成了。对这三年的历史要给以很高的评价。没有这三年就不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三年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时期。

2.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打的第二个漂亮仗。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进，改造取得了重大成果，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我们的几个五年计划中，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过的就是“一五”，以后有许多就是“混战”。但不能说“一五”完美无缺，是比较顺利的。大的工程就是三年建成。156项有苏联的帮助。那

^① 这是房维中同志1980年7月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研究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时没有瞎出点子，所出现的曲折是小的曲折。1956年基建投资多花了30亿，工资多花了8—9亿，市场搞的很紧张。所以，57年反冒进。总之，“一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但“一五”也有些曲折，最大的是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当时确实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否要搞那么大的规模一直反下去？这对党内政治生活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经济工作影响也不小。党内不敢讲话了。叫给党提意见，一反右，给党提意见的很多人成为右派了。这是党内生活很大的曲折。但“一五”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现在经济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还是“一五”打下的那些基础，是经济生活中的骨干。所以，“一五”应作为一个独立阶段。

3. 1958—1965年，8年。可作个历史阶段描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第一个大折腾。8年是一个周期：高——低——调整——恢复。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1961年实际上调整，1962年后还不行，1963—1965年继续调整。实际上是三年“大跃进”五年调整。1961年比较冷静下来了，由40度降到39度，1962年降到37度，从此转入正常。8年中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三年调整。这八年头脑发涨最高潮是1958年6—8月。叫做3—4年进入共产主义。钢产量当年要翻一番，1959年要翻两番。1958年武昌会议开始，提为了三千万吨钢而奋斗。15年后四亿吨钢，简直发昏了。这八年中也很多曲折，波有好几个：58年高；58年郑州会议到59年庐山会议前，降了些；60年又高起了；60年末，才往下下了。

4. 1966—1976年，11年。是第二次大折腾。可算作一个大周期。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结束。如果不粉碎“四人帮”，文化革命还得搞下去。因为当时写了个报告，说文化

革命76年可以结束了。张春桥批评说：文化革命怎么可以结束？

5. 1977年到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只有4年，也有曲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希望、大有前途、大有作为的时期。

以上划法，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把1—2段合为一个时期。但作为经济史，还是分开好些。

二、成功和失败的分野

30年的经验教训回到了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30年中，顺利的时候，是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失败的时候是因为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实事，第一，从中国实际出发；第二，要按照客观可能办事；第三，尊重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逆着干就吃亏。前八年搞得不好，工作大体上符合这几条，当时很谨慎。这八年的指导思想有几篇代表作：1950年有主席的《为争取国家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6年有《论十大关系》。总结了建设经验。

但因为前八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却骄傲了。不满足取得的成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个口号本来是对的，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更好地前进。但在这个口号下，发展到了主观蛮干，工作脱离实际，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两个方面的蛮干：生产关系上，搞了人民公社化，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要抢在赫鲁晓夫前边。生产力方面的口号是超英赶美。2—3年超英国，5年之内赶上美国。真是浪漫主义到

了极点！这3—4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多彩，别的国家没有，非常有意思。主席总结的：“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文化革命期间讲的），这八个字用到总结这三年是可以的。1964年主席讲过：不要再闹58年的大笑话了。回忆当时提出的口号：“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那里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漫时期，是非常动人的。但给党带来的损失相当严重。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亿！对这三年要作出实事求是地分析。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主席感到不行，6千万人上山，1千万吨钢，难，要压缩空气。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提出反对左倾冒险。头脑稍微冷静了些。从主席的《给生产队的一封信》开始，想解决这个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后，头脑又膨胀了。所以，1960年又第二次出现了瞎指挥，共产风。1960年4月，主席在天津讲：城市为什么不能挂人民公社的牌子？上海会议，主席的《十年总结》是代表作。八字方针，主席是赞同的。从1960年夏天开始到65年，建设上基本不再搞风了。1961年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缩短两个战线：基建战线、生产战线。到1965年搞“三五”计划，主席讲70年钢就是1600万吨。如果不搞文化革命，只两年钢就可以达到1600万吨。主席说：就是要品种多、质量好。当然，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插曲。1962年北戴河会议，政治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搞“四清”，这就酝酿着文化革命。生产上有影响的，但不大。八字方针是对的。总之，前三年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后五年落到了实处。

文化革命10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股逆流，是自我毁灭、自我毁灭。这既不合天理又不合人心。这10年总的说，在经济上老人家放手不管了。那时虽然还不断引用主席的

话，如“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但这10年的经济是从属于政治上的需要。“四人帮”有个口号：“不能给文化革命抹黑”。十年强打精神，总是说：“每年增长”，“经济形势大好，一片光明”。否则，就是给文化革命抹黑。所以，十年中，经济上有许多不是量力而行。另外，全党、全国人民、经济工作人员是不愿意看到把经济搞垮的。所以，这十年的经济状况要一分为二，不能完全否定。人们忧心如焚，有些事想挡但挡不住。1973年搞了十条，1975年搞了二十条，大家拍手称快，但“四人帮”恨之入骨，一棍子打下去。

30年不断出现复杂曲折的斗争，焦点是实事求是还是主观蛮干。大跃进是主观蛮干，文化革命更是主观蛮干，哪里是革命，是内乱嘛！

三、产生“左”的根源

30年来不断反右，但很长时期（58年以后）左是主要倾向。文化革命中是左倾路线。30年来，左的影响太大了，左倾空想，左倾蛮干，两次大的折腾是左倾空想、左倾蛮干的表现。为什么容易产生左？要作历史的分析，找社会根源、思想根源。1957年主席讲过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要革命的。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占统治地位，损失大，反复出现，是有一套理论基础的。当然，30年中也有反左的历史：1957年春天的反冒进是反左；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反左倾冒险；1961年后提出“八字方针”实际上是反左。但历史上的反左，往往反了半截又回去了。理论是：“反左必出右”（庐山会议）。反左不彻底，又转向反右。

四、搞经济史要把握中国的实际

到底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把握实际。过去我们说过：（1）国家大；（2）人口多：4亿——6亿——10亿人；（3）底子薄。1949年的时候很可怜；（4）科学文化落后；（5）商品经济不发达；（6）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影响非常严重。搞经济史，心中要有个数字，要明白中国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样，才有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国大、人多、底子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稳步前进，不应该急于求成。但正因为如此，穷，谁也忍受不了，又容易急。农村有的女孩子衣不裹体，有的食不果腹。1977年统计，一亿多人吃不饱。特别是到世界上一看，更不甘心，日本商品堆积，一看我们真是自惭形秽。因此不能安于现状，容易急躁，容易急于求成。毛主席1950年提三年准备，10年建设；以后提15年建成社会主义；赶英超英，本世纪末赶不上美开除球籍。这些都是急的表现。按中国的情况，一方面不应该急，一方面又容易急。1978年又急了。公布的10年规划又得收回来。现在是否大家都冷静了？还得防个急字。往往说人家外国多少多少大学，我们为什么不行？这没有看到人家已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想很快就赶上是脱离实际的。1979年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是224美元。而美国在19世纪中叶就是186美元。把人家现在的情况马上作为蓝本是根本不行的。我们之所以自不量力是因为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我们在世界上排到109位，并且不会很快赶上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不能开玩笑，不能头脑一热就

干。但国家大，容易热，动不动就想来个世界第一。国家大，底子薄，不应该骄傲，但因为人口多、块头大，又骄傲得起来。我们应该吸收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如大生产的经验等。应该发展商品经济。但因为长期内是自然经济，又排斥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30年的历史是大批资本主义的历史。当然，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是不能学的，是应当摒弃的。但很多东西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杠杆等应该学。30年搞打倒、批判资本主义，保护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保护了封建主义、保护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要知道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想的社会主义，不自觉的就有小生产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成分。研究中国的实际，要注意应该防止什么、可能出现什么？要把握中国的实际，在找出应该走的道路的同时，要发现容易犯的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找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其意义是很大的。如：发挥我们的优势；不要怕商品经济；搞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不马上追求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本世纪末只能达到小康之家。实事求是，是思想上的大解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我们的情况，外国人有的讲的还冷静点。

五、读几位领导人的文件

第一位是毛主席的。因为长时期他是主席，起决定作用的。

读陈云同志的东西。陈云同志是讲究实事求是的。30年中，正确的经济思想，陈云同志可以说是个代表。党内的稳健派是陈云。历史上反“右倾”，基本上是反对实事求是，相

当多的情况下是批陈云同志。

读总理、少奇、小平同志的文件。

要熟悉、了解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人物的经济思想。人民是主人。但这三十年间，领袖的作用是很大的。有时，一夜之间风向就变。1957年的下放，主席讲：一夜之间放下去，不能过夜。总理只好照办。

重要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的思想，在研究经济史中不能抹煞。对马寅初得正确地评价。要研究各经济流派之间的斗争。30年的经济史，也是经济思想斗争的历史。哪一派占主流，就影响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进程。

六、搞经济史要实事求是

党性、科学性是统一的。有以下几条：第一，史料要准确。搞历史不能靠道听途说。第二，不以人废言。不管是谁，凡是说过正确的话，在一定时期内起过作用，都要注意。第三，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不能取决于个人的爱好，不能看风向。这样，写出的东西才是通情达理的，为人民、为经济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对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

七、我们有信心搞好经济史

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年对若干历史问题要作出决议，这是有利条件。30年的历史非常丰富曲折，搞经济史大有搞头，很有趣味。30年中，当事人大部分在。考证花的力量总比搞解放前的会少点。但是要下功夫，也不能看的太容易了。不是手到拿来，30年充满复杂曲折。

许多事并不是很明朗。搞历史恐怕会碰到很多人物，包括现在的领导。这是个难处。那天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谁的头脑没个发热！我们不能站在局外人的地位上指手划脚。大家都在搞经济史，不能只在已有的材料中作文章，要探索。能不能作到一年后搞出个讲稿，再搞出科学著作，要靠大家努力。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先粗一点，再精雕细刻。

这些都是很浅薄的见解，重复了一些意见。因为我们要干这件事情，要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开步走，因此，想到这些问题和大家谈谈。

（解万英、李钧泽整理）

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概况^①

穆 家 军

我是搞新闻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就在农村搞新闻工作，进城后一直在新华社工作，过去住在农村办报，现在又一直搞农村的报导，所以对农村的情况以及解放后我们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些粗浅的了解。今天想谈三个问题，说错了请同志们指正。

一、中国农业两大课题的解决

所谓两大课题，就是毛主席曾经提出过的两个组织起来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解放前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但在旧中国，农业并不是那么落后。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农业，不要说在远东，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相当先进的。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农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鸦片战争后，我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将近一百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也还不是很落后，也还是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地位。那时中国的农业，无论是种植业或畜牧业都不很落后。农作物中如水稻，我们的总产、单产在世界上都不低，中国的水稻是首屈一指的。当时中国的小麦、大豆、高

① 1980年10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作的报告。

梁、谷子的生产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还有我们的蚕桑、茶叶也是首屈一指的。茶叶是从中国传出去的。英帝国主义从中国拿走茶叶，然后到印度的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去种植。日本的蚕桑业是从中国去的，所以当时中国的农业并不落后。那时，中国农业的积累力量很强，完全有能力自己积累来发展工业。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我们的外贸出超和白银外流，影响了农业的积累。否则，如果没有这一百年的白银外流，中国发展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的资金积累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过去有一种说法，似乎中国本来就很穷，是个经济落后、农业不发达的国家。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农业是发达的。当时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在封建生产关系统治下的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中国的封建关系和西欧等国有不同的特点。虽然中国从南宋时代开始的庄园制，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制相同，但宋代以后，经过明、清的统治，中国庄园制的农业遭到了破坏，所以形成中国的封建农业有这么一个特点，即是土地的集中并不太厉害，中国的自耕农很多。这方面我们没有确切的调查，但在土改中发现，自耕农是大量的，特别是北方地区。参加土地改革的同志都会有这种看法：旧中国的农村，完全是佃户的庄子不多，少数地区如长江流域稍多些。另外，解放前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富农经济都很薄弱，至于说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更是很少，只是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有极少数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剥削，因为办农场必须租地交地租，这样利润就很低，从而阻碍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有一些地主直接来经营农场，这种人比真正的富农经济倒多一些，因为他们自己有土地，不出地租，利润就高。

旧中国的农业主要是两大经济：一种是地主出租土地的租佃关系的农业；另一种就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这两大农业，究竟哪一个比例大些？我们也说不清楚，估计自耕农的比例大。

中国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在阶级关系上比欧洲还有进步的方面。例如俄国的农奴制，那些在地主农庄劳动的农奴，不仅可以随便买卖，而且还有人身依附关系。中国的佃户比较自由，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是很重的，但他们在法律上没有这种人身的隶属关系，地主和佃户是主客关系，佃户人身是自由的，没有象西欧那样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中国自从秦始皇时就走向统一，地主主要是依靠国家的统一政权，对农民进行政治上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而西欧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封建政治是不规范的，封建割据性比中国强，这与中国不同。

中国农业存在两大课题需要解决：第一大课题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需要解决，也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租佃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不是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中国的农民除了受地主的统治和剥削外，还受到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所以在中国解决封建生产关系的问题时，就提出要推翻三座大山，这与别的独立国家不同，中国还有反帝的任务。

毛主席提出，要通过组织农会，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来解决这个课题。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孙中山曾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平均地权），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任务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完成，他们也完成不了。我们党提出了推翻三座大山，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第一个组织起

来，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开始，经过十年内战时期老革命根据地的打土豪分田地，一直到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以及抗战结束后的土地改革（1952年为止），这第一大课题的任务才算完成。

第二大课题是现在提出来的农业现代化问题。这是要解决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改变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自给自足的手工农业，使小生产的农业走向大规模的生产。这问题也是根据主席提出来的办法——组织起来（第二个组织起来）来解决，路线是走集体化道路。

集体化的道路是列宁提出来的，就是合作化。苏联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进行改造中就遇到了农业经济中的小生产问题。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的革命，资本主义已经把生产社会化了，生产规模大而集中，生产不是为消费，而是为国内外的市场，这时就发生了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来解决这个矛盾。俄国革命成功后，就面临着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的问题。因农民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不能剥夺他们。使农业生产社会化走什么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讲过，列宁为了解决这问题便提出了合作化的方案，是根据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但与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来组织合作社，当然这是行不通的。列宁虽然提出了合作化的道路，但由于他逝世较早，没有来得及自己去实践，以后具体进行实践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在实践中曾有违背列宁思想的地方：一是列宁说的首先要解决农民的文化问题，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他们才能接受合作化的方案；二是列宁说的必须自愿和互利，引导小农组织起来，不能强迫。这二条说明

搞集体化快不得。但斯大林却操之过急，在1928、1929年就提出农民要集体化，结果在工作中出现强迫命令，没有遵守自愿的原则，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所以苏联的全盘集体化虽然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下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后遗症。很快，苏联就遭到经济困难，相当于中国195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农业减产、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以后被迫退让，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在这方面也同样犯了比较急的毛病，更有甚者，比苏联还有发展的就是人民公社。我们提出人民公社是企图解决第二步的革命问题，即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化到全民所有制，把集体的农业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这课题提出的时间太早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第一个课题解决得较好，推翻三座大山、解决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农民的土地问题都比较彻底，我们的土改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彻底。但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农村的生产力、生产资料，由于农民运动的激烈斗争，受到一定的破坏和损失。农民虽然经过土改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有所高涨，但另外还有很多农民得到土地后，生产有一定困难，当时农村的生产力还不如土改前强大。所以1953年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分析当时的农民在土改后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的生产积极性；一个是搞个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这个分析是很客观的，两个积极性确实同时存在。当时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是比较大的，流传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说法，正反映了农民这样的积极性。获得土地的农民，一天24小时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他都不会嫌累。愿意搞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只是部分农民有，这就是贫下中农。他们虽然获得了土地，但不是缺这就是缺那，生

产搞不起来，他们就很希望组织起来合作。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的变工队，就是根据农民的要求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党提出的合作化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哪一部分农民有要求，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哪一部分还没有要求，我们就不要去组织他们。土改后，原来的一些中农、富裕中农兵强马壮，他们想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愿组织起来拖带一些“穷光蛋”，怕吃亏。当时如果我们是根据列宁提出的自愿原则，那么就不必去强迫这些人组织起来。结果我们违背了自愿原则，硬叫他们组织起来，让那些贫下中农去占他们的便宜，靠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带贫下中农。我们这个平均主义思想，吃大户讨便宜的思想，自土改以来一直存在着。十年内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吃大户，这无形中就养成了农民吃大户的习惯。先把第一批大户地主吃了，然后再吃第二批大户富农；富农吃完了就吃第三批大户即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吃完了吃中农；待中农吃完了，就吃冒尖的。总之，不许冒尖，只准拉平，哪一个笋子冒了尖就要挨砍，这样，笋子永远也长不成竹子。同样道理，我们的农业生产如果永远吃大户，那就永远也发展不上去。后来的补划地主、漏网地主，其中很多都是中农，把阶级关系搞乱了，致使农民的生产热情一次次的受到挫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吃大户思想在我们党内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现在的所谓“穷过渡”，就是吃大户的思想。只要哪个生产队生产发展了，其它的生产队就想去吃他，硬要拉平。中国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不患生产能否发展起来，只患不均。可见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

解决第二大课题，就是把小农经济变成大农经济，使农业经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本身也有几个课题需要解决，一